引　言

孔子创建了儒家学说，阐发了儒家学派的基本特征，大抵是：以《诗》、《书》、《易》、《礼》、《乐》、《春秋》的思想为育人的内容，崇仁厉义序人伦为儒家的思想中心，培养君子人格，成为贤人圣人是儒家育人的最高理想；把仁的思想扩大到政治上，实行德治，重民生，行教化，旨在于维护以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社会。

儒家学派虽说有其共同的特征，然而，儒家思想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又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孔子贵仁。孔子思想的主要范畴是仁而不是礼。仁是新造，礼是因循。前者是第一位，后者是第二位。孔子要求仁者首先是以礼克己行仁，然后推己及人“爱人”。这就是修己及人治天下的思想。孔子的“爱人”“泛爱众”的仁的思想，顺应了解放奴隶的时代潮流。基于仁的思想，孔子主张富而后教、“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社会政治思想；倡说仁者“立人”、“达人”、“能好人，能恶人”、“杀身成仁”的道德风尚；实行“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这些，在传统文化中产生了良好的积极影响。为了实现仁，孔子强调对古代文献知识的学习和思考，对现实社会抱乐观进取积极用世的态度，参与政治生活并对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说，重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政治和伦理道德及其实践，学习与政治道德的统一，是孔子儒学的主要特征。

孟子在战国时期发展了儒家学说，使先秦儒学日趋于成熟。孟子儒学的突出特征是提出了以性善论为内容的心性说，开辟了儒学心性思想发展的道路，它对宋明理学和心学有直接的影响。由于孟子提倡先验主义的人性论和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说，重心性，“求放心”，轻视经验的认知，从而妨碍了科学的发展。孟子明确地倡说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为统系的儒家道统说，是对儒学的重要贡献。孟子的政治学说，成就巨大，影响深远。他大胆提出民贵君轻、易君诛君的民本思想，制定的“制民之产”和轻徭薄赋的仁政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进步的政治路线的范本。

荀子儒学，是对先秦儒学以及道、墨、名、法诸子之学的批判总结。荀子一反孔孟的意志天和道德天，明确提出自然天和制天命的思想；主张天人相分、天生人成、化性起伪，这是对道家自然天和儒墨重人为思想的批判总结。荀子的正名论，是对墨家和名家名实论的批判总结。荀子“隆礼至法”的礼法并重的政治思想，是由礼向法的过渡，是对儒法思想的综合。荀子思想主要特征是礼治。他认定礼是“人道之极”，“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荀子·礼论》）荀子为封建制度提供了完备的礼治理论。荀子的礼是新兴地主阶级的礼，而不是奴主贵族的礼。因为，荀子以礼义划分等级身分，表明他的礼是对传统礼的否定；荀子的礼不囿于修己的礼仪，而是强调发挥“治国平天下”的外部功能，使仁从属于礼；另外，荀子的礼是由理智作用而发现的理，是对传统礼的理性化。所以他说：“礼之理诚深矣”，“明者，礼之尽矣。”（同上）重视理智作用，也是荀子儒学的重要特征。表现在：第一，荀子究明“天人之分”，既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是清

醒冷静的理智表现。第二，荀子指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特质在于人有义。人有辨识父子之亲和男女之别的能力，人懂得应尽的职分，是人的理智作用的体现。第三，荀子的“缘天官”和“征知”的认识论，是外向的认知活动；他的“虚壹而静”的心知认识方法和反对蔽于一曲的“解蔽”方法，突出了认识的全面性和能动性。第四，荀子主张“王者富民”(《荀子·王制》),开源节流(《荀子·富国》)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君舟民水之喻，这些都是理智清醒的政治见解。荀子非常重视对儒家经典的学习，认为“始乎诵经，终于读礼。”（《荀子·劝学》）并且主张“隆礼义而杀（治）诗书。”（《荀子·儒效》）荀子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而且在传授儒家经典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汪中评说：“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荀卿子通论》）

董仲舒的儒学，第一次被汉武帝钦定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董仲舒儒学的特征是，使天人关系神秘化，把阴阳五行道德化和神秘化。前者表现为提出天人感应和目的论、人副于天、官制象天；后者表现为宣扬“阳尊阴卑”、“阳贵而阴贱”的思想，以五德(仁、义、礼、智、信)配五行,认为五行就是“孝子忠臣之行”(《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董仲舒提出阴阳五行说不是引导人们去认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而是“所以观天之志”（《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旨在于论证“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董仲舒所说的天，虽说在本质上是有意志的天，但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宗教天，因为这种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它是通过阴阳、四时、五行等自然运行规律而显示其作用，并且它阻碍向人格神的宗教方向去发展。董仲舒宣扬有意志的天，尊天为“百神之君”的实质，是为了突出尊君，抬高王权。他宣扬王权天授，王承“天意”明教化民，主张屈民伸君，在三纲中强调君权的绝

对性。

董仲舒提出以天人感应目的论为中心的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系，宣扬阳尊阴卑的伦理观，无疑是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路线的离弃。然而，他提出王道之三纲的春秋大一统的原则，抬高君权，独尊儒术，实行以德为主的德刑并用等政治措施，巩固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促进了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基本上符合时代的要求。

朱熹理学是儒家思想的崭新阶段，是儒家唯心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理学又称新儒学，它区别于先秦两汉儒学的特征是：第一，认定“理”是最高的范畴，建立了从宇宙观、认识论、道德论、人性论到历史观诸方面的庞大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哲学范畴，这种富有思辨形态的理学，既有别于具有道德实践特征的先秦儒学，又不同于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两汉儒学。第二，以孔孟儒学为主兼容佛老的唯心主义理论建立理学体系，这是理学区别于先秦儒学和两汉儒学的又一特征。第三，把封建伦理纲常提到本体论高度，借以论证它是最高的普遍的永恒的“天理”；通过“理一分殊”说论证封建等级秩序的合理性；理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借以维系封建纲常秩序，巩固封建制度。大概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的诀窍。

由于理学适应了巩固中央集权制的王权和维系封建纲常秩序的需要，适应了封建统治者消弭农民反抗地主阶级斗争的需要，“有补于治道”，因此，从南宋末年直到清王朝的七百年间，被奉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官方哲学。

理学有它迂腐、残忍的方面。比如当民族矛盾上升为南宋的主要社会矛盾时，朱熹主张“先安内而后攘外”，把斗争锋芒指向起义的农民军，进行残酷镇压；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教条；在狱讼问题上，主张“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

幼”的等级原则执法，以理杀人；理学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著作经典化，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标准答案，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由于理学空谈道德性命之说，“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社会上产生了“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龙川文集》卷十五，《送吴允成运干序》）的严重恶果。内心封闭，因循守旧，在现实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中起了保守以至于反动的作用。

然而，理学从它开始奉为官方哲学直到明中叶资本主义因素萌发以前，由于这一时期的封建经济制度处在发展时期，它给生产力以充分发展余地，作为封建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理学，就整体来说，起了维护经济基础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理学体系中容纳了一些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尤应予以肯定。比如朱熹讲“天”指“理”，重理性思辨，排除了天的意志和神秘性；重人事，强调心性修养，反对出世和绝对禁欲，阻碍了我国向人格神的宗教方向发展。朱熹提出和阐发了许多范畴，论述了阴阳无始、动静无端、一分为二、格物穷理、知行相须等学说，阐发了超越前人的精辟思想，他的“穷理”思想，反映了时代精神的特征，在中国认识史上有重要贡献。朱熹是从张载到王夫之这一哲学发展“圆圈”中的中间环节。

王守仁心学，集儒家心性学说之大成，是儒家心性学说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王守仁心学的特征是“致良知”，他自称是“圣门正眼法藏”，通行“天下之大道”。良知观念首创于孟子，但孟子的良知说只是先验的道德学说，并没有展开论述。陆九渊论到了“吾心之良，吾所固有”（《象山全集》卷三十二，《养心莫善于寡欲》），他也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王守仁集良知说之大成，在反对朱熹理学分心物为二、心理为二、知行为二的斗争中，建立了他的心物为一、心理为一、知行合一的心学体系。“心”，是心学的最高范畴，“良知”是“心之本体”，“良知”是“造化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精灵”，“良知”是“天理”，它是检验善恶的指南针。“心之虚灵明觉”即良知，良知之外别无知。而“良知”是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观念。王守仁倡说“致良知”的目的，在于复明心之本体，达到的途径是为善去恶的修养工夫，即存天理去人欲。可见，王守仁的良知说，是把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人性论合而为一的思想体系，这是心学的一大特色。

王守仁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万化根源总在心”，断言“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是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他的知行合一说，销行以归知，“致良知”，就是体认“良知”和实行“良知”，这是对封建道德的直觉的省悟，把认识引向蒙昧主义的认识论。王守仁把封建道德观念高扬为支配人们现实生活的先验的精神本体，以主观的道德修养作为救世的良方，妄图通过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方法消解社会上存在的一切矛盾，借以挽救封建社会的危机。

从张载的气本体论到朱熹的理本体论再到王守仁的心本体论，是从自然到伦理到心理，是理学的形成、发展到终结的过程，这是历史的理论的发展的必然结果。心学体系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孕育着自我否定的契机，终于在王学后学的引发下导致王学的分化瓦解。

王守仁的心学，在主观上是为“破心中贼”以巩固封建社会秩序，然而由于他强调治学的“自得”、“自信”，坚信内心的“良知”，反对以孔子、朱熹的言论作为检验认识是否真理的标准，反对偶像崇拜，反对迷信言从，反对传统思想的束缚，因此，他的“致良知”说却为思想解放开辟了道路，给解除陈腐的传统观念和进行社会变革以启迪。王守仁在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方面提出了一些光辉思想，比如把“立志”作为学习的首要问题；提倡“师尊”即教师要自尊自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身教为先；主张“教学相长”、因人施教、“随人分限”量力论

学；结合儿童特点进行生动活泼的教育，反对实行强制教育；等等，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批判地吸取。

王夫之的儒学，是经学、史学、文学无所不包，卓然成家，特别是他的哲学颇有创新。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批判的总结者和最高发展者，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的批判的总结者，是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者。

王夫之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概括了新兴“质测之学”的科学成果，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农民反抗封建统治斗争的教训，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成为封建时代哲学可能达到的理论的最高度。王夫之儒学的特征是：第一，以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来说明自然和社会以及思维领域里的发展规律。王夫之对诚、天、命、性、道器、理气、有无、虚实、动静、一两、体用等范畴作了全新而明确的阐发，并论述了范畴之间的联系；通过逻辑的论证肯定了“气”实有的客观性和无限性，朴素唯物而辩证地说明了天地万物的发展规律；揭示出天人、己物、心理、能所、格物致知、知行等范畴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突出了主体对客体的正确认识，强调发挥人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在知行关系中肯定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从而把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论思维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在认识史上做出了卓越的重大贡献。第二，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老庄玄学、佛学的唯心主义和宋明唯心主义理学、心学展开全面的深入的批判。王夫之的批判，是“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进行哲理性的分析与批判；在批判中有扬弃，注意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加以改造和升华，借以丰富自己的理论。第三，王夫之治学重史的研究，从历史上国家兴衰得失中总结经验教训，探求补偏救失之方，究明“为治之资”（《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借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命运。把历史提升到哲学高度加以评析，或以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观点来解

历史。由于王夫之对历史文化抱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深刻反思，他在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特出贡献，表现在：他批判了在历史领域中的天命论、复古论、五德终始说、三统三正说、正统论、君心决定论等各种传统的史观旧说，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观，这不仅彻底否定了神秘主义的历史观，也从根本上离开了以伦理价值来判断历史的儒学传统。王夫之提出“立君以主民”、“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治国“有法”又要“择人”的进步政治思想，主张“天下之事，自与天下共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民主思想，堪称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但王夫之强调理欲之辨、君子与小人之别，说明他思想中还存留着地主阶级正统观念的烙印，还没有完全摆脱理学的影响。

中国封建制度发展水平高，封建社会延续时间又长，在这一基础之上产生了灿烂的中国封建文化，而儒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对儒学进行深入研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和总结，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对儒家思想和儒家代表人物应该如何评价？一种倾向是，借维护民族传统的旗帜，抬高孔圣人和保卫孔孟之道，或尊新儒学为时代精神。二者都是抵抗时代的挑战。另一种倾向是以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儒家思想作为振兴民族建设新文化的出发点。我认为，盲目地固执地尊儒崇圣，或者简单地虚无主义地否定传统文化，都是不可取的。

对儒家思想应当进行全面地深入地研究，作出历史主义评价。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王夫之，是儒学发展史中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研究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可以了解到儒家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趋向、时代的特征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总结，明辨精华和糟粕，吸取理论思维的教训和政治的借鉴，推陈出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第一章

孔子首创的儒家思想

一儒家的产生及其特征

什么是儒家，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可是，谈到儒家产生的渊源，儒和儒家有什么区别，看来有些茫然。比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写的《辞海》中释“儒”是：“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专为贵族人家相礼的一批知识分子。”又说：儒家是“孔子创立的学派。”这里，把儒和儒家学派区别开来是对的。至于谈到什么是儒，就不确切了。认为儒从巫、史、祝、卜分化出来的，值得商讨。巫，是巫婆，装神弄鬼替人祈祷的人。《说文》指出：“巫，祝也（段注：祝乃觋之误，觋，能斋肃事神明者。）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祝,是祭祀时祷告鬼神的人。《说文》：“祝,祭主赞辞者”。史,是史官,记载史实,兼管天时历法。《说文》“史，记事者也。”韦昭认为：史即太史，“掌抱天时，……皆知天道也”。（《国语·周语下》注）卜，是占卜迷信。古代以火烘龟甲，从烘开的龟纹中预决吉凶。《说文》：“卜，灼剥龟也，象炙龟之形，一日象龟兆之纵衡也。”

《汉书。艺文志》谈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

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里第一，谈到了儒产生的渊源以及儒者的职分；第二，指出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孔子，并概括了儒家学派的特征。

班固认为儒家是出于“司徒之官”，帮助君主观察“阴阳之术”，顺应四时变化规律行事，施教化民。司徒是掌人伦教化之官。《孟子·滕文公上》记述了尧“使契（本作偰，《说文》：偰高辛氏之子，为尧司徒，殷之先）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赵岐注：“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妇妇，兄兄弟弟，朋友有信，是为契之教也。”《书·舜典》也谈到：“帝（尧）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五常）不逊，汝作司徒，敬敷（布）五教在宽”。大概这就是儒出于“司徒之官”的渊源吧！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周礼·地官·大司徒》）上海编《辞海》主此说。对此，我不以为然。

儒的称号从何而来？据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贾公彦疏：“儒，以道得民者，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谓学子也。”这里提出了四个问题：一、儒是掌握“道”即“六艺”的知识分子。二、儒以“六艺”为依据向侯王陈述礼义善道，对公卿大夫的子弟进行道德教育。三、儒是直接从师氏、保氏之官演化而来的。师氏之官，是“掌以媺（善）诏王，以三德教国子。”《周礼·地官·师氏》郑玄注：“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也谈到：“师也者，教之以事，而谕诸德者也。”保氏之官，是“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周礼·地官·保氏》）郑玄注：“谏者以礼义正之”。《文王世子》也谈到“保也者，慎其力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可见，儒在当时谏教的对象上自王

侯，下至贵族子弟，并不包括一般老百姓在内。虽说“儒，以道得民”，但这里的“民”指的是贵族子弟的学士，“以道得民，民亦谓学子也”，就是这个意思。四、以儒命名，取意是什么呢？

《说文》“儒，柔也，术士（儒生）之称。”柔在这里应训“安”。《尧舜典》中有“柔远能迩”句，孔安国传：“柔，安。言当安远乃能安近。”《诗·大雅·民劳》也引了“柔远能迩”句，郑玄注：“柔，安也。”儒，也可训“优”、“濡”，柔、优、安、濡是互训的。所以，郑玄在《礼记·儒行篇》下注：“儒之言优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孔颖达疏也指出：“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可见，儒的原来涵义是从保氏之官演化出来的一种主管教化的官，职能是以六艺为依据对侯王谏政和对贵族子弟进行道德教育。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儒是为贵族人家相礼的一批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欠妥。因为第一，从儒的起源来说，如上所述，儒并不是以相礼为职事。第二，相礼之始概出于“殷士”，但并不称儒。《诗·大雅·文王》中谈到：“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是说，殷亡后，“殷士”有美德，识时务，及早来为周人服务。他们在周人举行灌鬯祭的时候，穿着殷人有黑白饰文的礼服，戴着殷人的帽子，为周人助祭，捧酒送酒。这里的“殷士”，就是殷人中从事相礼的人。当时，“殷士”并不称为儒。把“殷士”视同相礼之士，这是以后的事。如“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礼记·檀弓上》）是说，子张举丧，公明仪为子张主持丧礼，表达他的意愿，以红布覆盖在棺上，以丹布为质地，不做柳墙不做羽饰，在红布的四角作画，文如蚁行。这就是“殷士”，即相礼之士。第三，既然儒家之士从事相礼活动，那么可不可以称儒家是“为贵族人家相礼的一批知识分子”呢？我认为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样概括儒家，未能反映儒家的本质和特征，未免失之于太简。

儒，早在周代已经产生了。可是，孔子创建的儒家学派却是春秋末期大变革的社会产物。二者虽说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但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郭沫若在《论儒家的发生》一文中正确指出：“儒（指儒家，著者识）并不是原来就已经有了，因孔子而复兴，而是春秋的末叶，社会大转变产生出来的历史成果，孔子为其代表。过去贵族垄断知识，就是读书、习礼乐为贵族的专有权，到春秋时代，乃普遍到下层阶级。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很大的变革，也是孔子的一个很大的功绩。至于儒在当时为什么不发生于其他的国家，而独发生于邹、鲁，…… 这有它的道理，因为邹、鲁在列国中文化最高。”（《沫若文集》第十二卷）

儒家学派在春秋末期是适应什么样的社会需要而诞生的呢？在奴隶制时代（或领主封建制），由于学在官府，诗、书、礼、乐为贵族阶级所专有，下层人没有资格读书习礼乐，所谓“礼不下庶人”。可是，到春秋末期，由于社会制度的大转变，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贵族统治的崩溃，“学在官府”的局面“失其守”了。随着原来的贵族阶级的降落，为贵族所豢养的礼乐之士也失业散到四方。如《论语·微子》所载：乐太师挚到齐国，亚饭乐师干到楚国，三饭乐师缭到蔡国，四饭乐师缺到秦国，击鼓的方叔入居黄河之浜，摇小鼓的武入居汉水之涯，乐官少师阳和击磬的襄都入居海滨。这些礼乐之士，他们凭藉自己的本领，招收和教育弟子，从事丧葬相礼之事，赖以谋生。这时，过去没有读过书、习过礼的新兴地主阶级，当他们身居统治地位以后，强烈地意识到礼乐不可缺少，迫切需要学习礼乐；愿为新阶级效劳的人们，为了“学而优则仕”，也需要拚命地学习礼乐。“先进于礼乐，野人也”。（《论语·先进》，以下凡引本书，只注篇名。）先学习礼乐然后做官，就是最好的例证。新阶级和愿为新阶级效

劳的人们提出了这种社会需要，而原来在官的礼乐之士在客观上又提供了这种可能，这样，儒就从靠个人的谏政、德教、教书、相礼为职事，逐渐发展为既教书育人，又问政事，以仁义礼乐为指导思想和以平治天下为目的，并为之终生奋斗的社会团体。于是，具有政治色彩的儒家学派，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诞生了。

儒家学派有什么特征呢？

《庄子·渔父》谈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以治也。”《汉书·艺文志》评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

第一，孔子创建的儒家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指导门人言行的思想基础，后来儒者就把这几部书奉为“六经”。孔子谙熟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典籍和射、御、术、数等技艺知识。他自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当时不称经（《庄子·天运》）。《论语》中也谈到孔子“执御”、“执射（《子罕》）以及论射的道理（《八佾》）。孔子非常重视诗、书、礼、乐。在他看来“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孔子所以如此重视“六经”，是因为“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司马迁也有类似的看法。“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由于“六经”对于育人，治世的重要，因此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以“六经”作为施教的主要教材。司马谈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同上）。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

·孔子世家》）正因为儒家同六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清代学者孙贻让说：“春秋时代，凡能诵诗、书、礼、乐、射、御、术、数六艺教民的人，便叫做儒”。（《周礼正义》）

第二，“崇仁厉（励行）义”（《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儒家思想的中心，是儒家区别于其他百家的本质特征。因此，有人说：“孔氏门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恶其违仁义而尚权诈也。”（《意林》及《太平御览》卷七七引）特别是“仁”，即“道”，是儒家最高理想。儒家倡说仁义礼乐，“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主义的宗法等级制度，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第三，儒家把“仁”的思想扩大到政治上，就是实行“德治”，“为政以德”（《为政》）。儒家正是通过道德仁义学说，“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仁义学说也是儒家治国安邦的政治理论。而实行仁政或“王道之治”，是儒家的政治纲领。

第四，儒家尊崇的理想人物是古圣贤君。孔子歌颂说：尧，真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又只有尧能够效法天。（《大伯》）他又歌颂舜说：舜和禹真崇高啊！他们富有天下而不据为己有。（同上）孔子又以周文王、武王的统治作为施政效法的榜样。他说：文王武王的政治，陈述在简策上，有文王武王君主存在，社会政治就俱兴；文王武王君主不存在，社会的政治就废亡。（《中庸》第二十章）不难看出，儒家既有思想理论，又有政治纲领，为了宣扬他们的学说和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们，周游列国，大喊大叫。因此，简单地把这样的然家学派归结为教书和相礼的一批知识分子，显然不妥当。何况还有“善为礼者不相（不做相礼）”（《荀子·大略》）的一种异说。

二 孔子的生平和著作

孔子（公元前551年一前479年），是春秋时期我国的大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子是宋国公孙嘉的后代。公孙熹字孔父，孔子以先祖的字为姓。他的曾祖父叫孔防叔，祖父伯夏，父叔梁纥，母颜征在。叔梁纥做过陬邑宰。孔子三岁时父亲死去。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青年时，他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畜牧的“乘田”等小吏。五十岁时，由鲁国的中都宰擢任为司寇，参与国政。因政见不同，他离开了鲁国，周游各国，历经坎坷。“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欺凌）夫子者无禁。”（《庄子·让王》）终因不被重用，十四年后，他又返回鲁国。孔子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大学问家。春秋时期公认他学识渊博。“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他还懂考古知识。有一次，孔子在陈国，正赶上有一只中了石箭的鹁鸟飞到陈侯院里死去。陈湣公便派人问孔子是怎么回事？孔子回答说：这鹁鸟是从很远的北方飞来的，石箭是肃慎箭。这是周武王灭商时，肃慎的贡物。这一贡物赐给武王女儿大姬，她嫁给虞胡公封在陈国，表示不忘周德。派人到故府去验证，果然如此。（见《史记·孔子世家》或《国语·鲁语下》）孔子一生主要致力于教育和整理古代典籍工作。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不仅孔门弟子、孟子赞孔子为“圣人”，就是法家韩非也异口同声称“仲尼，天下圣人也。”（《韩非子·五蠹》）司马迁评论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取正）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可是很久以来就盛称孔子著六经。显然这是溢美之词。孔子同六经确是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对他是否著述、删订或整理六经要具体分析。比如司马迁认为孔子删诗的说法就不可信。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当时《诗》已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小雅》、《大雅》、《颂》等诗篇，它的编排次序与今本同。何况孔子时年只有七、八岁，怎么可能删诗呢？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朱熹也认为孔子不曾删《诗》，他说：“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传上说去。”（《语类》卷八十）孔子精通《礼》。“孔丘年少好礼”，鲁大失孟厘子临死前曾嘱咐儿子孟懿子拜孔子为师。后来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向孔子学过礼。（《史记·孔子世家》）在孔子晚年，他编定过《书》和《礼》。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同上）孔子对音乐有相当研究。不仅会琴、瑟、磬等乐器，喜欢唱歌，还精通乐理。他说：音乐是可以懂得的，演奏开始，气氛热烈，继续下去，和谐、明晰，不绝于耳，然后乐成。（《八佾》）他又指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说苑·修文》）《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正因为孔子修订了《乐》，“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根据鲁史作《春秋》，记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史实，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至于孔子同《易》的关系是一个争议的老问题。孔子很少谈《易》，在《论语》中仅有两处谈到：一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另一处是引《易经·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孔子世家》），是可信的。孔子研究过《易》并有所发挥，这是有据的。如他引九三爻辞及其发挥，全章虽说强调人有恒德的重要，但也说出了学习《易》，不要用在占卜上。这就启迪了儒家学《易》，摆脱了宗教迷信的束缚。因此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然而，说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甚至认为他作十翼，就难以信实。因为十翼的著作年代，据考证有些当在战国中期甚至秦汉，孔子当然是著述莫及。孔子在教学中同弟子们的谈话以及同当时君卿大夫的问答，为弟子们记录下来，编辑为《论语》。它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可靠的重要资料。郭沫若说“《论语》的简练和精粹，无论如何是必读的书。”（《今昔蒲剑·关于接受文学遗产》）他如《左传》、《国语》和先秦诸子著作中引述孔子的言论，都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三“天道”和鬼神

（一）“天命”、“命”、自然天

孔子的天道观是什么性质的？学者们或引述《论语》中的某些材料，论证它是唯心主义的；或引述《论语》中另一些材料，论证它是唯物主义的。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都有部分的道理。

应该说，孔子谈了一些有意志天的言论。他说：“知我者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